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Modern Europe

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

[美] 弗雷德里克·L.努斯鲍姆 著
(Frederick L. Nussbaum)

罗礼平 秦传安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

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

[美] 弗雷德里克·L. 努斯鲍姆 著
(Frederick L. Nussbaum)

罗礼平 秦传安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美)努斯鲍姆(Nussbaum, F. L.)
著;罗礼平,秦传安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2. 4

(常青藤·汉译学术经典)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Modern Europe

ISBN 978-7-5642-1099-1/F·1099

I. ①现… II. ①努… ②罗… ③秦… III. ①经济制度-
经济史-欧洲-现代 IV. ①F1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9313 号

□策 划 吴晓群

□责任编辑 黄 荟

□封面设计 张克瑶

□责任校对 王从远

XIAN DAI OUZHOU JINGJI ZHIDUSHI

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

[美] 弗雷德里克·L. 努斯鲍姆 著
(Frederick L. Nussbaum)

罗礼平 秦传安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东路 321 号乙 邮编 200434)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春秋印刷厂装订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20.75 印张(插页:2) 372 千字

印数:0 001—4 000 定价:39.00 元

序言

在本书中,为了方便美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我试图把沃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一书中所包含的对欧洲经济史的综合阐述的主线挪用过来。尽管我双手并用,从桑巴特教授所积累的卷帙浩繁的材料中拿来了不少东西,但为了对他公平起见,我还是应该声明:我并不打算假装自己局限于他的材料或他的阐述。另一方面,疏漏之处,过错在我,而且这样的疏漏比比皆是。

桑巴特的综合阐述,对今天的美国读者和研究者有着特殊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牵连,但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在经济意义上,欧洲的政治单位并不像它们在政治意义上所宣称的那样彼此独立和自决;一些重要的制度变革总是越过政治边界,而且常常无视这些边界的存在。在本书中,我特别费尽周章,试图保留甚至强化桑巴特著作中普遍化的“宏观经济”特征。我还作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以避免用政治史或技术史来取代对经济行为的模式和制度的记录,取代对挣钱和花钱方式的记录。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持续不断的、习惯性的定义对政治史的普遍误解,这个术语总是用于各种不同的内容。我希望,在每个部分和每个章节中所界定的形式依然是运动的,并因此既是历史的材料,也是理论的素材。我并没有试图以对现今情况的研究来取代历史研究的真正职能,对过去经验的认识与我们对今天的认识无疑是一致的。

很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在不同的阶段阅读过本书的手稿,并依据他们各自的思想流派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但在一次涉及内容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冒险中,他们有益的批评始终是最有价值的。在此,我想对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教授、马克斯·汉德曼(Max Handmann)教授、维特·鲍

登(Witt Bowden)博士、E. P. 切尼(E. P. Cheyney)教授、A. P. 瓦茨(A. P. Watts)教授和J. D. 麦基(J. D. Magee)教授所提供的建设性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桑巴特教授和他的出版商(Duncker & Humblot 出版公司),我要深表感谢,感谢他们的慷慨许可,让我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材料。

对桑巴特教授的感激,我觉得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人喜好的意义,这是一个相距遥远的弟子对于长期研究他的作品所带来的智力成果表示感激,他的作品渗透到了我的整个历史观当中。我最初的意图是打算扩展这篇序言,以便把我对《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对当今历史学的重要性所作的分析包括在内。然而,这一冒险在我的手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篇序言的恰当限制,只好等另外的机会了。在此期间,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教授在他的重要专著《晚近德国文献中的资本主义:桑巴特和韦伯》(*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Sombart and Weber*)中,弥补了这样一个不足:至今尚没有人用英语从经济学的观点来阐述桑巴特作品的重要性。

如果说本书中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套用桑巴特在解释他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时的说法——那不仅要归功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这些可取之处就来自它。我不可能自吹把那部超过3 000页的巨著中一切有价值的重要东西都集中到了本书有限的篇幅之内。如果这篇摘要在某种程度上像桑巴特的原著一样,起到了为读者开启新的、有意义的思考路径的作用,尤其是,如果它起到了给桑巴特本人的作品开山引路的作用的话,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弗雷德里克·L. 努斯鲍姆

1933年1月31日,怀俄明州拉勒米市

目 录

序言/1

导言 欧洲经济史问题/1

第一篇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

第一章 生存经济/13

第二章 向交换经济过渡/23

第二篇 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

第三章 作为经济组织的国家/45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技术装备/58

第五章 不同人口群体对资本主义的适应/77

第三篇 早期资本主义

第六章 经济动机和经济形态的转变/105

第七章 市场转变之一：外部方面/118

第八章 市场转变之二：买与卖/132

第九章 生产的转变：从手工业体系到工厂/145

第十章 18世纪末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欧洲/164

第四篇 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

- 第十一章 经济能量的释放/183
- 第十二章 新重商主义和新帝国主义/189
- 第十三章 现代技术及其在工商业中的应用/198
- 第十四章 与企业有关的资本结构/206
- 第十五章 人口与劳动力供应/217
- 第十六章 市场的合理化/231
- 第十七章 企业组织的合理化/246
- 第十八章 整体经济生活的合理化/266
- 第十九章 经济生活的不同形式/283

参考文献/294

作者简介/323

译后记/324

导言 欧洲经济史问题

历史问题

历史是在残存证据的基础上对过去经验的想象性重构。这一重构行为的创造性品格,迫使历史学家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抽象的问题:如何界定他打算处理的那个实体?即便是传记作者,尽管他对自己要处理的东西颇有把握,可一旦传主是某种类型人物的范本,有着所有或大多数种类特征,那他就不得不创造他的人物了。如果他着手写一部政治史,他的任务只会更加复杂。没有了对生物身份的把握,他所面对的难题,就是要建立彼时彼地政治生物体的品格和特征,要把彼时彼地的人民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各种形式聚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有必要把这一聚合体表现为不断进化、不断经历,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生长和衰朽。这个难题常常被忽视了。例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声称,英国政府或法国政府遭到了教会或封建贵族的蚕食,仿佛那时的政府具有充分发展的现代政府所具有的全部职能和权利似的;而事实上,像我们如今所构想的那种政府,才刚刚开始发展,并已经开始蚕食历史上早已确立的教会和封建贵族的职能,注定要发展到把几乎所有职能都吸纳进来。同样的难题被强加给宗教史家、艺术史家,或在人类经验的其他任何方面的历史学家。

经济史问题

界定这个问题的重担同样也交给了经济史家,你甚至可以说,他的这副担子更沉重。与实体名词比起来,形容词有某种含糊的不确定性。因此,形容词短语“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家对于他们认为在这一

类别下应该谈论什么的构想有更多机会呈现出多样化,而且,事实上他们所谈论的内容也会呈现出多样化。有一个共同点始终存在,即像所有动物一样,人也必须寻找食物。很遗憾,这个共同点由于同样适用于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因而没有历史。然而,不像野兽,人对食物的追寻首先是一个社会事实。他靠物品交换、合作生产来谋取生计。这是一个政治事实。人们不得不为别人劳动。在一切经济社会中,财产都是根据政治权力来定义的;劳动条件也是如此。这也是一个技术事实。人显而易见地、独一无二地是一种使用工具的动物。在人类存在的整个历史上,除了最近的大约占到1%的那段时期之外,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们留下的工具。这还是一个数量事实。社会与个人所积累和消费的物品数量,与时俱变,大不相同。经济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其历史特性,换言之,就是要经过我们所熟悉的一切人类事物和尘世事物的循环:出生、生长、成熟、衰朽和消亡,在时间和空间里不断演化。

与经济生活的这些不同方面相对应,有几种不同的研究其历史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一直被人们以突出而重要的方式使用着。正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进步,充当了波特(Porter)的《国家的进步》(*Progress of the Nation*, 1836)及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工程师列传》(*Lives of the Engineers*, 3卷本,1861~1862)的出发点。这种类型的经济史编纂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工业革命讲稿》(*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4)中达到了顶峰,那本书在语言上明确地显现了那种有点荒谬的表达。

我们可以称之为政治的经济生活史的那种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的态度和作用——是另一组重要著作的材料和主旨,其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坎宁安(Cunningham)的《英国工商业的发展》(*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第6版,2卷本,共3册,1915~1921);莱瓦瑟(Levasseur)的《1789年之前法国工人阶级和工业的历史》(*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avant 1789*, 第2版,2卷本,1900~1901)、《1789~1870年间法国工人阶级和工业的历史》(*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 第2版,1903~1904)以及《法国商业史》(*Histoire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2卷本,1911~1912);冯·因纳玛-斯特奈格(Von Inama-Sternegg)的《德国经济史》(*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3卷本,共4册,1879~1901)。这些19世纪下半叶的著作,都是在当今的社会学观点得以发展之前阐述的,主要处理法律对经

济生活的调整,阐述并认识各国政治权力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商业政策。可以说,它们是法律的历史,而不是经济生活的历史。

作为一个社会学事实,经济生活一直由社会学家在他們所说的“历史”中加以描绘,但称之为“回顾性的社会学”没准更合适些。在此类著作中,最有才华的当数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英译本,1927)。在同类作品中,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的《国民经济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893年及后来的各种版本;1897年英译本题为《工业发展》(*Industrial Evolution*)]确立了经济生活发展所贯穿的连续阶段的概念。毕歇尔的“阶段”如今不再按照他所构想的那样被人们接受,但他的基本观念卓有成效地被应用于其他人的著作中,如诺曼·S. B. 格拉斯(Norman S. B. Gras)的《经济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严格来说,这些作者的目标根本不是历史,不是重构过去的经验,甚至也不是根据不同人的类似经验所共有的元素进行科学的归纳。

然而,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的发展,使得另一种方法成为可能——即便不是直接口授了这一方法。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试图把世界史构想为一系列的文化,各自有其作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演化的特性、目标和价值;经济学家同样试图把经济活动构想为一套制度,作为相关文化的一部分在不断演化。从这个观点来看,经济史就是制度史,是获取和支出的社会方式在一种或几种文化中不断演化的历史。这样的经济史包括技术和立法,作为其核心问题的次要特征。它不同于回顾性的社会学家的方法,因为它的目标纯粹是历史的,换句话说,它描绘的是独一无二的演化,而不是从几种演化中的相似性推导出一般性的概括。当然,这样的历史必然有着共同的起源。作为整体的文化以及作为其特殊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都是按照生命的角度来构想:生长、成熟、衰朽和消亡。这样的历史,其问题的基本部分,就是特定文化中的人在着手解决食物和利润的问题时所采取的不断变化的心理态度。经济生活被构想为有机群体的众多功能中的一个单位,而特定文化中的人,正是在这个有机群体中发展的。这样一段简短的概括,就是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教授在其《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 3卷本,共6册,1916~1927)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本书——它主要源自桑巴特的著作——所使用的方法。

欧洲经济史问题

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欧洲是一片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从乌拉尔河一直延伸至北极、大西洋和地中海。作为一个世界史概念,它是一个社会动态实体,与地理概念并不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这个社会实体起源于上述半岛的内部,但绝不可能把这两者解释为一致的。如果从亚得里亚海至易北河口画一条线,再画一条线切掉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的大部分,那么,我们就有了一幅相当准确的图画,这个最初的社会有机体就出现在这幅图画中。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已经使它远远超出了这些最初的界限,远远超出了整个半岛的界限,事实上到了地球的最远边界。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与那个产生他们的社会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远离其文化和祖先的古老家园。欧洲文化的经济组织在扩大其统治范围上特别有效率,甚至进入了其他组织完全不能渗入的区域,更准确地说,就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宗教影响、审美或道德标准都无法进入的区域。那么,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将要研究其经济方面的这个欧洲,其起点比地理意义上的欧洲更狭小,其最终的发展却是世界范围的。



现代欧洲

这样说的隐含意义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几个欧洲国家历史的累积性组合。政府和资本主义作为欧洲文明互补的两个方面，彼此对对方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但是，我们并不关注政府的经济方面；我们对政府的关注，更多的是关注资本主义的政治方面。^{〔1〕}

欧洲经济文化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如果说欧洲的经济社会在空间上是有限的，那么它在时间上也是有限的。它与世界史的关系，以及它对其他文化的继承或不继承，也需要加以考察。

本节标题所暗示的问题的这一部分，将是我们在整个研究中始终关注的，换言之，就是不断演化的欧洲经济社会在世界史中的位置。然而，在开始讲述这个漫长而惊人的发展故事之前，有必要试着陈述一下我们所定义的一个社会动态实体的欧洲经济生活与之前的经济生活的一般关系。

这个经济意义上的欧洲，毗邻所谓的“拜占庭—阿拉伯文化”，并短暂地与之处于同一时期。这一文化的政治形态是双重的，其宗教形态也是如此——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东罗马帝国与伊斯兰。把它设想为一个世界史的单位，它在时间上就可以追溯到西方尚未开化的时期，当时，罗马的野蛮（但武力强大）服膺于它所征服的那些民族的新兴文化力量。这不是一个可以标定准确年代的时期，但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征兆来标示一般事实的出现。一个最清晰的征兆是罗马帝国的建立。就算直到公元 212 年卡卡拉（Caracalla）才把罗马的公民身份扩大到整个帝国，就算直到公元 285 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才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东方专制主义政体，就算直到公元 325 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了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但是，公元前 52 年的情况依然表明：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征服实在是太强大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不可能仅仅是占有它。长期以来，东方宗教一直以其对超自然经验的独特坚持，困扰着罗马城。密特拉教和基督教都是东方宗教，早在一场互相残杀的决斗使其中之一独霸至高无上的位置之前，它们就开始征服整个罗马世界。罗马的年轻人去雅典、士麦那、亚历山大城受教育。东方的教师

〔1〕 在桑巴特的影响下，我们将习惯性地把欧洲不断演化的经济社会称作“资本主义”。这一表述在后文将会得到更明确的定义。在这里只需指出，其含义并不是说，只有这个社会使用“资本”；甚至也不是说，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较大数量资本的存在是它的重要特征。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始终出现在任何经济活动中，就这方面而言，现代经济社会与早期社会的不同，仅仅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

们在西方找到了他们最赚钱的活动场地。

当君士坦丁大帝把首都迁到新的城市时,他只是在承认一个由来已久的事实:可用的力量之源不再来自西方,而是在我们所说的“东地中海”地区——这个说法颇为含糊。

那么,就经济方面而言,拜占庭文化在地理上与东地中海地区是一致的。查士丁尼(Justinian)所赖以组织他的政府——还有他的贸易政策——中心的,便是拜占庭、士麦那、贝鲁特、安条克和亚历山大城。他的政府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生活,已经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罗马文化的最终衰败所带来的痛苦和恐惧毫无关系。

查士丁尼用来装饰其首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一个符号,标志着这个社会有能力生产巨额的剩余。罗马法典的编纂是一个明证,表明这个社会有非常复杂的情况要处理。查士丁尼希望与中国和印度建立直接联系的志向,反映了这一经济组织有能力渴求并掏钱购买异国他乡的贵重商品。桑蚕的引入说明了一种企业精神,这种精神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前的西方无人匹敌。当罗马再次衰落为一座座村落,杂乱地散落在七山之间,散落在纪念过去辉煌的古迹中间,君士坦丁堡却有百万居民,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不是靠互相给对方洗衣服为生的。

这种文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有着双重的政治和宗教品格。在公元 630~公元 875 年之间,阿拉伯人建立穆罕默德的宗教和政治帝国,从东印度群岛沿着南地中海沿岸,直到比利牛斯山脉。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将它们视为一体。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商业和金融交易,各自都有着高度发展的产业协会的形式,然而,政府对行会的控制,比我们稍后将会看到的西欧的类似制度更加彻底。两者都以高度发展的技术为标志,这样的技术让少数在公元 1000 年前看到它的西方游客惊讶不已。两者都有远程贸易,商路从中国和东印度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德国北方的原材料产区,延伸到意大利和高卢。显然,两者都有巨大而充分的贵金属的供应。阿拉伯人重新开发了被忽视的西班牙银矿。希腊金币是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标准硬币。在 11 世纪,刚好就在十字军东征之前,拜占庭政府的年收入高达近 5 亿美元。

到这一时期,两者都在衰落,而且就像任何正在衰落的文化一样,很容易受到野蛮人的入侵。从东方来了土耳其人,从西方来了十字军。拜占庭在西方的前哨——威尼斯、阿马尔菲、热那亚——开始掉头而去,转向西方,并为西方人效劳,就像他们曾经为东方效劳一样。讲述拜占庭和阿拉伯衰落的故事,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操心的事，但在别的地方，我们将看到，在 1095~1453 年，这一古老文明的地区是如何为最早的欧洲殖民帝国的发展而效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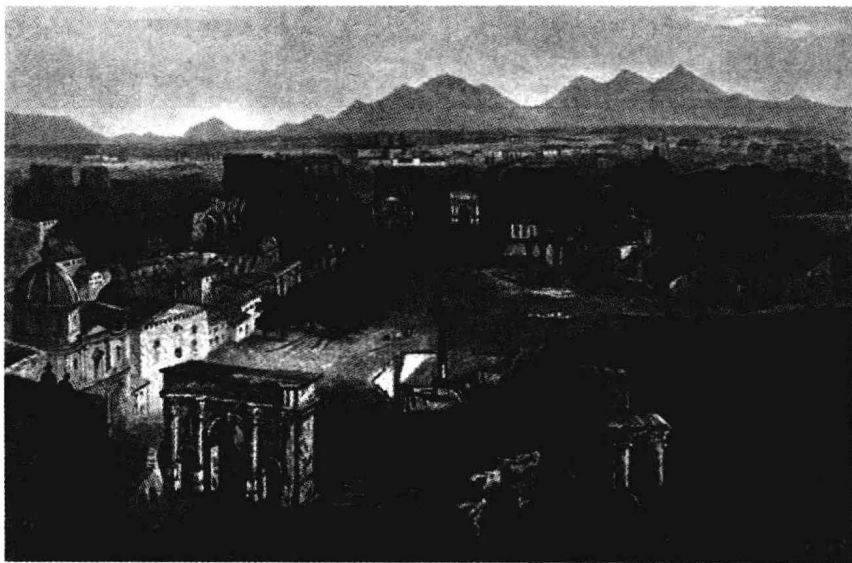
罗马人的经济组织在东方被更高级的拜占庭—阿拉伯文化所取代；而在西方，它甚至衰落到了快要消失的尽头，而且并没有面对任何同等组织的竞争。

有一段重要的时期，我们所关注的那个欧洲与这种东方文化紧密相连。尽管罗马在经济上依然是希腊文化的前哨，但与此同时，它已经征服了西班牙、高卢和不列颠；而且，这些帝国内部的国家，以及莱茵河与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边疆，亦即帝国的外部，充当了工商业更先进的东方的殖民地区。它们是原材料的来源地和非竞争性的市场。

罗马征服高卢的直接后果是一次繁荣的增长，繁荣本身就显示了一次相当可观的人口增长，中心城市尤其变得人口众多。工业在行会中被很好地组织了起来，特别是发展出了大规模生产廉价外衣和廉价陶瓷的能力；农业则由于藤本植物和灌溉技术的引入而得以改进。马赛衰败了，但纳博讷、尼姆、阿尔勒、里昂、波尔多、图卢兹、鲁昂，甚至还有巴黎，都拥有了各自作为城市的开端，回应罗马的政府集中、罗马的贸易和罗马的和平所带来的刺激。特里尔、科隆和美因茨充当了“两个德国”那些巨大的永久性兵营的供应基地，某种程

度上也是与莱茵河对岸的野蛮人做生意的贸易基地。

一部关于罗马行省的权威著作[查波特(Chapot)的《罗马世界》(*The Roman World*),英译本,1928]告诉我们:“关于罗马不列颠的经济生活,我们的材料来源非常少。”看来,只有一部分被罗马化的不列颠,与高卢相比,依然保持着更纯粹的殖民地特性。尽管罗马的道路网络四通八达,但它们主要是军用的而不是商业的。生活方式本质上依然是农业的,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中心城市。我们发现,很多豪华的乡村宅第都带有人工供暖系统,以及另外几种适应气候变化的装置。推测起来,这些应该是从某种成功商业的利润中掏钱置办的。农业似乎由于引入了更高级的意大利技术而得以改良;大量的牲畜出口。锡矿的开采转为政府垄断,它们的生产率和销路得到了极大的改进。此外,很多陶瓷也被生产出来了。



颓败的罗马城

然而,高卢和不列颠似乎都没有非常牢固地与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整合在一起,而且最早感觉到了3世纪和4世纪的分崩离析。原因与结果之间不可能清楚地区分开来,但经济的衰退和政治的衰弱看来是一致的。到了4世纪,法兰克人已经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比利时那些明显被人抛弃的广袤地区。从2世纪末起,不列颠仅仅是非常宽松地被控制着,而且当罗马的军队在公元407年撤走的时候,就连留给凯尔特土著人和日耳曼入侵者模仿和采用的罗

马组织也比高卢的要少。

罗马把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损失,始终留在了历史上曾经易动感情的野蛮人的心里,这些野蛮人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进入了罗马西部地区,决心要抓住它的价值,要成为它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这个遗憾留在了我们的心里,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每每在试图抓住它的时候,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不见了,不由得迷惑不解,暗自哀伤。从来没有一个人试图解释波斯帝国的消失或埃及文化的消失,但人们却总是试图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人们提出了各种“理由”:罗马人所谓的不道德,生育率的下降,大庄园的发展(由奴隶和不自由的劳工打理),等等。所有的这些过度解释,迫使你退回到一个简单的自明之理:一切持续过漫长时期的文化,到最后都消失了。像生物学中的生与死一样,这一事实本质上依然是无法解释的、是神秘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以简略的方式描述衰亡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衰落是西罗马的事。在东罗马,东方文化依然强盛而充满活力,足以产生伟大的表现——最伟大的法律综合:《查士丁尼法典》;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最高品位的新宗教:伊斯兰教;尤其是这一文化有能力再存活一千年。那么,消失的是西罗马的文化,以及西罗马所彰显的东方文化。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所发生的事情是:(1)人口的下降,城市与乡村同为荒墟;(2)技术的衰微,如建筑艺术几乎衰减为最简单的形式;(3)商业衰退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沿街小贩的出现竟然成了特别立法的对象,比如在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法律中;(4)重要的资源,像西班牙的银矿,都被闲置了。

有些经济衰退反映在阻止这种衰退的努力中,比如戴克里先在公元 302 年颁布的那项著名法令,一步步试图把人民固定在他们现有的地位上,迫使鞋匠(包括他们的儿子)依然做鞋匠,中上层阶级则继续承担征税的重任以及各自治市的其他政府职责。似乎很明显,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作为从一个繁荣社会的政府发展而来的罗马政府,其负担被证明对西罗马社会来说太过沉重,而此时也已经不再繁荣。听任政府的职能落入地方权贵、元老院议员和教士之手,这些人把大片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 公元 590~公元 604 年担任罗马主教)的通信载录,显示了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是如何天翻地覆的。自公元 4 世纪末起,罗马的作家们就不断讲述人们如何逃到野蛮人那里,并发现与野蛮人在一起生活更好、更轻松。当野蛮人作为征服者到来的时候,他们养活的那种政府——简单政府——足以胜任好几个世纪。

在现代欧洲经济制度史(这刚好是本书的主题)中,帝国经济生活在西罗马的消亡,其理论的或哲学的含义,多半比它与这些制度的特定历史联系更为重要。人们所珍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甚至还有技术,都有可能消亡,尽管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保护和维持它们。

欧洲的经济生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从罗马那里“继承”了某些重要遗产,尤其是罗马法。然而,典型的方式是通过重新发现,而不是通过直接继承,这样的遗产继承才得以实现。到9世纪末,整个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庞大的罗马聚合体已经从西欧消失不见了。在某种意义上,西欧的经济生活即便在当时也远非原始。诸如纺织、烹饪、货币的使用、铁的使用这样一些技术,作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仍在继续传承。在另外的意义上,对我们来说是在更加重要的意义上,经济生活的社会组织,在罗马帝国曾经达到了那样高的水平,也已经几乎彻底消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悠久的欧洲,其经济生活是重新从头开始的,几乎没有来自过去的传统来决定它的形态、它的过程以及它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它是欧洲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